

历

史

学

家

随

笔

丛

书

板凳集

彭

明随笔



广西人民出版社

戴逸◎主编

板 登 集

彭明随笔



历史学家随笔丛书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新登字 01 号

策 划 彭 匈 曹光哲

责任编辑 廖集玲

责任校对 高 健

历史学家随笔丛书

板凳集

彭 明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 14 号)

850 毫米×1168 毫米 1 /32

9.25 印张 193 千字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1999 年 5 月 第 1 版

1999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219-03966-2 /K·802

定价:14.00 元

序 言

应广西人民出版社之邀,编选了这样一本小书。文章虽不多,却是从上百篇中选出的。其中大部分是发表过的,有一部分则从未发表过。而“旅美日记”则完全是新写的。

范老(文澜)的“二冷”说,引导我走上治学的道路。“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是自己奉行的治学格言,故将这本小书定名为“板凳集”。

出版社编选这套丛书的目的,在于引导青年人走上正确的治学之道。因此,在“治学漫谈”里,大部分是对学生和报刊读者讲的。其中《博导经验杂谈》则是在一次博士生导师经验交流会的报告,也

是我经常对博士生谈话的内容,过去从未发表过。文章既要照顾读者的要求,使其有可读性,又要大体反映出自己一生的治学经历。“五四”是我一生研究的重点,为其付出的心血也最多,因此,“五四”研究方面的文章多选了几篇。其中,《我是怎样研究五四运动史的》是拙著《五四运动史》(1984年初版,1998年修订再版)一书的序言。多年以来,我在校内外从事怎样做科学研究的报告,大体上都是根据这篇序言的思路。《民国史》是近年兴起的“显学”,学术讨论会多次召开,我经常应邀参加这些活动,或作报告,或写论文,李新教授主持的大《民国史》,我也应邀参与其事。因此,这方面的文字也多选了一些。

多年以来,为一些专家、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专著写过一些序言和评论。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学习过程,大都是有感而发的。这些文字都不太长(包括一些为史学杂志写的纪念感言),所以也收录在一组里,名曰“书刊点评”。

我今年已七十有四,每当忆起杜甫的名句:“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赠卫八处士》,总是感慨系之。特别是对那些自己身受

教益而又早逝的师友们,不禁怀念之情。“故人追忆”中对胡华、陈旭麓两位教授交往的回忆,表达的就是这种情感。当然,我们活着的人是不应消极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应该是我们遵循的箴言,我想这才是对亡者的最好纪念。

坐冷凳并非是死读书。它和前人说的“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得益彰的。司马迁成就《史记》那样伟大的著作,固然和掌握了“石室金匱之书”分不开,但也和他进行实地考察“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密切相关的,后者补充了前者之不足,解答了前者的疑问,因而才能使“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出于对先贤的仰慕,我在从事历史研究时也经常游历、考察了一些地方并作有笔记。这些,比较集中地反映在拙著《五四运动史》、《五四研究》等书中,其他则杂乱地反映在多年的日记、笔记本中。在这里,仅收录了“干校记游”、“旅美日记”两种。其他的则待来日整理了。

“附录”的五首诗也是从自己多年“打油”中选出的。自己并非诗人,更不懂旧体诗的格律,因为李新、

孙思白、陈旭麓(已逝)等师友多年相交与共同编书,骥尾之后,也跟着胡诌了一些,主要是记下当时的心情,始终是不敢发表的。但选出的这几首,却受到李、孙二公的鼓励。考虑到这几首,或与“板凳”有关,或属近作,故也附录在这里。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回顾一生,虽然坐了半个多世纪的“冷板凳”,但成果并不显著,空话仍然不少,何止一句?余生尚有精力,当仍本范老的治学精神,继续弥补自己的过失。

戊寅岁末于人民大学林园五四书屋

目 录

序 言	1
-----------	---

治学漫谈

我的五四书屋	3
板凳须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句空	8
谈观点和史料的统一	12
科学研究是知识更新的重要途径	17
博导经验杂谈	22
我是怎样研究五四运动史的	28
如何评价历史人物	42
探索——理论研究的重要职能 ——人大教授彭明先生一席谈	55

学术文存

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	61
“五四”研究断想	76
谈五四时期的理性精神 ——纪念五四运动 70 周年	88

关于半个世纪以来五四运动史研究的若干情况	106
中华民国档案和中华民国史	119
中国大陆的“黄埔”研究	125
关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几个问题	132

书刊点评

《爱国教育家陈嘉庚》序	141
《宋子文评传》序	144
《从屈辱到崛起》丛书序	151
《灾荒与饥谨》序	154
《叶挺传》序	157
《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序	160
《周恩来经济建设思想论》序	162
《邹韬奋传》序	164
我和《历史教学》	
——为《历史教学》创刊 35 周年而作	166
扬长避短 就地取材	
——寄语《党史与现实》	169
我和《历史研究》	
——为《历史研究》创刊 40 周年而作	170
回顾与希望	
——祝《民国档案》创刊	173
文史资料工作要讲求治学严谨	179

故人追忆

养成一代好的学风	
——纪念范文澜 100 周年诞辰	185
怀念旭麓	190
科学研究的艰苦岁月	
——忆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编写	

.....	192
《中共党史人物传》50 卷编后感言	
——并纪念主编胡华教授	199
干校记游	
黄山行	207
绍兴散记	212
旅美日记	
一路顺风与一场虚惊	221
别开生面的家具市场、意义深远的中文学校	226
电访周策纵、唐德刚教授	230
到巴尔的摩市参加钢琴比赛	233
为老伴过 70 岁生日	237
到洛杉矶,参观好莱坞影城(HOLLYWOOD)	239
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圣地亚哥分校(UCSD)	
.....	244
加拿大三日游	248
十进华盛顿广场	256
纽约、费城一日行	270
“含饴弄孙”小记	276
附 录	
鸡公山审稿	281
勉桑梓子弟	282
由皖过沪登“东方明珠”有感	283
游同里度假村	284
游周庄度假村并夜宴小店	285

治学漫谈

我的五四书屋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华北大学奉命移驻京都,四部(研究部)被分配在东厂胡同一号即胡适曾住过的宅院(这时胡已乘机南下)。我于3月间作为四部的先遣人员先期到北平。这时副校长兼部主任范老(文澜)从中央所在地西柏坡附近早已到达,他和戴老(范老的爱人)就住在胡适住过的房子里,生活、办公、读书均在此院的正房。正房和前院之间,有一个大会客室,很气派,暖气管都包装得很讲究,上边的木罩特别宽大,我进城后的第一夜就睡在会客室的一个暖气管的木罩上。这个院落的电话(传达室内)很好记:“5400”,胡华教授告诉我,这个号码是胡适向电话局要来的,为了纪念“五四”。确否不知,反正我当时是相信了的,要不,怎么会如此巧合呢?

1984年5月,我的《五四运动史》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同年10月,人大调整住房,把我分在林园5楼4号。这原是“文化大革命”前人大副校长的住房,有一间办公室直通楼道,而又有另一门直通内室,内室又有一正门。这样,属于办公的来访者即可直接进外边的门,不必登堂入室。我进住后也就把这间办公室当作了自己的书房。

一日,胡华教授来此小坐,他笑着说:“你刚进城时住过的胡适住宅的电话是5400。今天,你又搬进5楼4号,将注定你这一生要研究五四了。”我听了后,只当作笑谈,也未在意。不想此后的不少来访者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因为研究‘五四’,所以住房也是5楼4号?”我连忙回答说:“不!不!这完全是巧合。”后来听说系办公室也向来访者介绍说:“你到5楼4号去找吧,他是研究‘五四’的,很好记。”

天长日久,这种巧合,也为家庭认可了。老伴还为此刻了一枚“五四书屋”的图章,并盖在她所习作的花鸟画上。

这就是五四书屋名称的由来。

但,这间书屋,却是一只木箱、一个书架逐渐积累起来的。

进城之前,我在正定华大四部当研究生,四部设在王士珍(袁世凯手下的三大干将之一)家的宅院里,我和一位资料员同住在王宅正房边的一间耳房,共用一张旧式的方桌,读的书都是从资料室借来的,数量不大,也无书架,都散乱地放在桌子上。进城之后,我由四部调到一部当助教,这时有了一只宝贵的书箱。箱子原来是农村木匠做活的一种大工具箱,也没有任何油漆。它原是从正定四部往北平迁移时运书的许多大木箱中的一只,算是我到一部工作时借用的,并装

有从资料室借来的许多图书。这只木箱伴随了我许多年,对我的教学和科研帮助很大。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我当上了第一批的主讲教员,算是有了一间单独的住房,除了原有的木箱外,又增添了一个书架。这时,也有了点稿费收入,连同工资余额,着实购进了不少图书,一人高的中等书架差不多布满了,虽然如此,但仍称不上书房。

1956年人民大学在张自忠路一号盖了三座红楼,我也分得了一套三间的住房。这时,家庭人口增加不少,但我仍挤出一间作为我的书房。特别是在何干之教授家看到了他新订做的八个大玻璃书柜,使我羡慕不已。在勒紧裤带、省吃俭用的情况下,我也集资仿做了四个玻璃书柜,并购置了大批书籍。这样,算是有点书房的味道了。1958年人民大学在西郊盖成一批林园楼住宅,我家由城内搬到西郊,但书房的形式变化不大,因为有若干年我在近代史所八角亭编书,吃、住及所用的资料都是所里供给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的书房也受了灾难。红卫兵小将不断来“借书”,我的上初中的孩子也把我的许多书当作“四旧”卖废品。特别是两派武斗时,竟把我住的楼房当作前沿和武斗指挥部。全家被扫地出门,只好到亲戚家去借住。归来时发现图书散失过半。不过这时已无心研究,只要能安居下来,就是最大的希望了。

说是“无心研究”,但自己对尚未完成的《五四运动史》的手稿(已有30万字)仍念念不忘。因此,在1969年人大停办、在江西余江办五七干校时,别的我可以一切不带,但有一只木箱是必须带的,这就是前面说的那只入城时不久从解放区

带来的木匠工具箱,箱子里放着 30 万字的手稿以及有关修改、补写的图书、资料、卡片等。

到江西余江后,干校挑选了 100 余名壮劳力组成基建连,从事打石头、锯木头、盖房子,我是被选中的一个。100 多人住在一个大采石坑里,上面加了顶子,五七战士们把它叫做“水晶宫”。宫中并排挤着 100 多张木床,不过也留出了若干狭小的通道,以便进出。我的床位正好在狭小通道的尽头,因此我利用这个位置倚墙放下了我那只宝贵的小木箱。这样,我就能在打石头、锯木头、做馒头等劳动之余,坐在小马扎上来反复阅读、修改我那部手稿了。

这样,我在离开了北京的林园书房后,又在干校狭小的天地里建立了自己的小书房。

从干校归来,特别是人大复校后,我又有自己的书房了。改革开放的春风使学术界复苏、繁荣,报刊、图书也多起来了。老伴特为我的四个玻璃书柜请木工师傅在上面又加了四个顶柜。这样,从地下到屋顶,书籍就布满了整个一面墙了。为了不妨碍家人的休息,我在书房中安置了一张单人床。就是在这间“陋室”里,无论寒冬酷暑我都晚睡早起地每日工作十几小时。这样,终于完成了 50 多万字的《五四运动史》初稿,并于 1984 年 5 月正式出版。

同年 10 月,搬进了现在的五四书屋,就更为宽敞了。除了原来的四个书柜外,又增加了四个,这样就不是布满一面墙而是两面墙的书籍了,单人床不再设于室内,而是换上了沙发。虽然仍属“陋室”,但也开始接待“鸿儒”与“群贤”了。十几年来,专家、学者(包括国际的及港台的)来访的不少。我与研究生的聚会,也都在这间“陋室”里,谈笑风生,带来欢

乐不少。

近年来购书不多了(因为图书泛滥,买不胜买),但所受赠书却是不少,而且是大部头的多卷本,并附有光盘。因此我的书房又不得不扩大到内室,并添置了 VCD 影碟机,播放这些声像文史作品。

去年夏季我到华盛顿探亲,在航空博物馆中看见一个数据,即现在的一个芯片(Chip)要顶上过去 100 万个二极管、三极管。我也和几位当年研究电脑的青年博士(都是儿子的同学,70、80 年代去美学习的)交谈过。他们说当年开始研究这些东西时,也未料到今天发展得这样快。眼看 21 世纪到来,将发展到怎样的地步?他们也很难预料。

我们正处在知识爆炸的年代,单靠一间书房是不能适应了(我的书柜中的书具已摆成内外两层,查找很不方便)。在儿、孙们的帮助下,家中添置了电脑,相信通过国际互联网络阅读中外文史图书资料也不是很遥远的事。我的书房已无法再扩大了,也不准备再增购很多图书了。